

---

# 北京大学和大阪经济法科大学合办 纪念二战结束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牛大勇

---

1995年8月8日至11日,北京大学和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大学合作,在北京友谊宾馆举办了以“和平、合作、发展,迎接二十一世纪”为宗旨的学术讨论会,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十周年。日本、韩国、朝鲜、蒙古、菲律宾、加拿大、俄罗斯、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者近百人到会发表研究成果,展开热烈的讨论,力图在有关二战进程和影响的广阔视野中,总结历史教训,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中国的抗日战争问题,是会议研讨的重点。本文着重就此对这次学术研讨会略加述评。

## 一 战争的性质、教训、各种政治力量的作用及遗留问题

北京大学教授罗荣渠在大会主报告中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伟大,不在其规模空前,而在其整体上具有反法西斯侵略的进步性质。那种把苏联参战前的二战性质视同一战即帝国主义之间的争斗的传统观点,对中国、埃塞俄比亚等最先同东西方法西斯侵略者抗争的国家来说,尤其不公正。法西斯侵略之所以未能及时被制止,就是因为苏、美、英、法等国一开始即对这场战争的性质认识不清。而正义的一方之所以最后获胜,也正因为它们在反法西斯的共同旗帜下结成了伟大同盟。很多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吸取。中国内部抗日统一战线的军事合作远没有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军事合作那样成功。而战后海峡两岸史学界对抗战史研究的一些片面性,影响了对“中国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之一”这个命题的论证。

战后对日本侵略罪行的清算也不彻底,以至日本某些人否定侵略罪行的逆流越来越泛滥。报告指出:“一个民族不能患集体健忘症,更不能受那些有意制造集体健忘症的人误导。”<sup>①</sup>

与会的日本学者一致肯定了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大阪经济法科大学教授金子道雄在大会的另一个主报告中,从法律、道义、人权和国际通例的角度,论证了即使某些国家政府已放弃了对日本国的索赔要求,日本政府仍有责任对这些被侵略国的受害人、民间企业和团体进行赔偿。报告列举了日本应予赔偿的若干问题与事件,指出承担赔偿责任,不仅有利于日本彻底反省战争的教训,而且有助于真正实现日本与亚太各国人民的理解、友好与合作,协力迈向新世纪。<sup>②</sup> 这个报告在与会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应,大家对日本学者的诚挚和远见,报以热烈掌声。

日本经济法科大学教授岩崎允胤以“在侵略战争结束五十周年之际”为题,历数了九一八事变以降十五年间日本的侵略暴行,指出军国主义和天皇制是造成日本殖民侵略的根源。他认为,在民主制度下确立主权在民、反对侵略战争、自由与正义的牢固信念,才能保证日本不重蹈军国主义的覆辙。

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教授赵昌翼论述了日本军国主义以“大东亚共荣圈”为旗号走向太平洋战争的历程,揭示了这一理念的蛊惑性和侵略实质。北京大学教授王晓秋对甲午战争和第二次中日战争的性质、手段、成败因素及其间的联系和历史教训,做了宏观比较。<sup>③</sup>

## 二 抗战史事与人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天石研究员根据新发现的档案史料,对抗战期间中日双方通过孔祥熙等人的渠道进行的秘密

---

① 参见《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4期。

② 金子道雄:《日本的战争赔偿责任》,《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4期。

③ 《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4期。

谈判作了详细探讨。他指出,早期的谈判反映出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对抗战缺乏信心,后来的谈判则主要出于策略考虑。谈判终无结果,表明国民政府不仅抵抗住了日本的军事进攻,也粉碎了它的政治谋略。<sup>①</sup>与会者对杨先生的论文很感兴趣,就国民政府对日谈判的动机、效果、让步底线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北京大学丁则勤教授从另一个角度研究了这一问题。近年我国有学者提出,自七七事变至南京陷落,日本一面侵略,一面仍期望与中国政府议和,无意彻底推翻中国政府,全盘接管中国事务。<sup>②</sup>针对这种观点,丁教授依据大量的日本档案文书,指出中日早期媾和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日本自七七事变后已从局部性间歇性扩张转变为全局性连续性侵略,迅速彻底地灭亡中国,已在其统治集团中成为压倒性优势的意见。无论它提出什么和谈条件,它自己都必然不会遵守,都只是为了配合其军事打击。而当时的中国政府在国内外各种因素、尤其是中国人民的影响下,也恰恰不能接受日方那些条件。日军当时已在各占领区积极筹建伪政权,所以,不以蒋介石政府为交涉对手,是其合乎逻辑的发展。丁教授还对中国政府打算退让的界限,做出论证。<sup>③</sup>与会者认为他的探索使这个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值得进一步争鸣。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曾景忠先生对滇缅战场的作战环境、作战形式、与中国东线战事的关系,中国与盟军的配合等问题,做了系统论述,认为相对中国东线战场而言,这里可称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西线战场。有学者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提法,值得推敲。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杨奎松副研究员对平型关战斗史实加以严密考证,对被歼对象及人数、缴获物资的品种与数量等问题提出独到见解。<sup>④</sup>人们认为年轻学者中的这种严谨求实的学风应

---

① 《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

② 《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8页。

③ 《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

④ 《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10期。

予提倡。北京大学历史系刘一皋副教授尝试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群众运动的动员模式与影响,指出这种模式给党政机构提供了相当大的便利。不但重大任务的突击,而且日常工作都采用运动的方式进行,基层群众也由此养成了特殊的行为方式。运动的主轴是阶级斗争,往往掩盖了政府与农民、干部与群众等方面的矛盾,运动中的民主原则与法制秩序相悖,负面影响很难彻底纠正。<sup>①</sup>

### 三 中国战时的对外关系

抗日战争给中国对外关系和国际地位带来异常复杂而深刻的影响,提交给会议的许多论文探讨了这一问题。

日本新泻大学芳井研一教授以“中东铁道事件与巴黎不战条约”为题,论述了1929年中苏这场武装冲突给远东国际关系造成的影响。日本政府和关东军内的一些人把中东路事件当做警钟,从对苏对美战略出发,加紧推行侵略“满蒙”的政策,否定了币原外相等人支持巴黎不战条约并与中国政府谈判解决权益悬案的方针,最后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张振鹂研究员指出,中国背负着不平等条约之轭投入救亡图存的抗日战争。抗战的伟大成就,不仅是制止了日本侵略,收复了战前日本攫夺的一切权利和包括东北、台湾、澎湖在内的全部领土,而且是废除了各国(包括英、美、法等15国)对华不平等条约。这个胜利洗雪了鸦片战争以来的百余年间外国侵略造成的民族耻辱。学者们鉴于以前学术界对中美、中英新约的“实质性不平等”问题及战时与战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进行过争鸣,但受到了非学术性的干扰,故尔此次对这个问题极感关心和重视,期望能展开正常的学术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陶文钊研究员撰文分析了影响战

---

① 载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等编《五十年祭——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论文征文选集》(以下简称《五十年祭》),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年10月出版。

时中国外交的若干因素,指出全民族坚持抗战是影响中国外交的根本因素,但中国政府的务实政策,处理国际关系大体得当,美、英、苏等大国的利益同中国利益终于在反法西斯的共同目标下接轨,国际形势的发展等因素也都对中国外交有积极影响。<sup>①</sup>与会者同意陶先生的分析,并讨论了国共的合作与摩擦、胡适等人物对抗战时中国外交的各种影响。

北京大学教授林承节高度评价了印度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认为他们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尽自己之所能,从道义上和物质上帮助了中国人民,表现了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sup>②</sup>徐万民副教授则探讨了国际交通在八年抗战中的战略地位,认为它是中国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搏斗中赖以生存并坚持到胜利的生命线。中国的反封锁斗争有许多成败得失。国际交通梗阻严重地妨害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和中国战场发挥作用,并对战时和战后的中国政局有深刻影响。<sup>③</sup>有学者认为这方面的研究以往不多,徐先生做了很有益的探讨。

北京大学牛大勇副教授将档案文献与口述材料相结合,澄清了一桩过去未引起注意的似小实大的历史事件:在抗战受降、国共争占要地之际,美军飞行员在运送国民党军之前,先从延安向太行山十八集团军(原八路军)前方总部空运了一批中共各大战略区的主将,其中包括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陈毅、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肖劲光、杨得志、邓华、李天佑、宋时轮、陈再道、陈锡联、王近山等,当天或稍后又空运了聂荣臻、罗瑞卿、肖克、郑维山等。这批将军得以迅速赶到前线,实施战略转变,先于国民党军展开,及时组织了上党等一系列战役。文章论述了此事的决策背景和历史意义,认为是“影响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一次战略空运”。<sup>④</sup>与会者饶有兴味地

---

① 《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4期。

② 《五十年祭》。

③ 《五十年祭》。

④ 《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

观看了有关此事的历史图片,并讨论了历史偶然性与必然性等问题。

#### 四 其他诸问题

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抗日战争,给中国人民以直接的支持,汇成亚太地区的反侵略反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洪流。北京大学梁志明教授的“论二战期间日本对东南亚的占领及其影响”<sup>①</sup>、马克承教授的“世纪的潮流与越南的觉醒”、李谋教授的“彷徨—幻想—觉醒:二战进程与缅甸民族意识的成熟”,蒙古国立大学 Luvsandoogyn Chuluunbaatar 教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强盛”等论文,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亚太战区反日本法西斯战争的进程和影响。

北京大学刘祖熙教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关波、苏关系的几个问题”<sup>②</sup>,徐天新教授的“论苏联二战结束前后的对外政策”<sup>③</sup>,郭华榕教授的“注意,坦克!试析 1940 年法国溃败的军事教训”<sup>④</sup>,郑家馨教授的“非洲与反法西斯战争”<sup>⑤</sup>,军事科学院彭训厚研究员的“论反法西斯战争的经验教训”等文,分别论述了反法西斯战争在世界各地的情况,从而为人们审视与回顾中国抗日战争,提供了更加广阔壮观的历史背景。

除总结反法西斯战争的经验教训之外,很多学者还着重探讨了亚太地区战后发展的种种问题。其中有不同看法的一个问题,是对日本新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复活的危险性的估价。中、朝、韩学者一般认为对此趋势必须高度警觉并严加制止。<sup>⑥</sup> 日本学者则多倾向于认为,在当今民主制度下,从极左到极右的各种政治思潮和

---

① 《世界历史》,1995 年第 4 期。

② 北京大学历史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世界发展》(北京大学第一届历史学年会论文集),第 1 卷。

③ 《世界历史》,1995 年第 5 期。

④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世界的发展》。

⑤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世界的发展》。

⑥ 徐勇:《论日本的新军国主义》,《中国人力资源开发》,1995 年第 2 期。

势力都会有所表现,不可能用控制舆论和限制政治活动等非民主的办法去“消灭”某种思想和政团。但与从前的法西斯专制不同的是,日本人民以至国会在如今政治多元化、利益多元化日趋加强的体制下,绝无可能再被某一集团驱赶上侵略战争之路。何况反战反军国主义的民主潮流在战后日本社会和人民中,一直以绝对优势占据着主导地位。围绕这些看法,学者们会继续进行了讨论。

会议气氛始终热烈、友好、紧凑、活跃。在闭幕晚宴上,中、日学者即兴同唱日本歌曲“北国之春”,朝、韩学者随之合咏期望祖国统一之曲。亲历抗战的中国学者献讴救亡长调,日本学者和以当年日本的反战民谣。在各国学者和日方主席吴清达教授的一再鼓励下,中国大陆和台湾学者也联袂高歌历史名曲《满江红》(岳飞词)。会议以各国学者携手并肩、同台踏歌而告结束。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